

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發長文談中美關係引起爭議

前幾日,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對美中對抗的現狀發佈了一篇長文,引起大家的熱議,以下為原文翻譯

1988年,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訪問印度總理拉吉夫·甘地時說了這樣一段話。

“近幾年有一種議論,說下個世紀是亞洲太平洋世紀,好像這樣的世紀就要到來。我不同意這個看法。”2020年的今天,鄧小平的觀點被得到證實。

臥薪嚥膽數十年,亞洲成長為不容全世界小覷的力量,經濟成就更是卓著,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。亞洲經濟體的規模更是一路領先,創下19世紀以來的最強成績。

然而,時代在更迭,真理卻歷久彌新,即使到今天,鄧小平的告誡依然警醒着大家:亞洲世紀既非必然實現,也非命中注定。

亞洲之所以繁榮,是因為二戰結束後美國處於國際“老大哥”的位置,這給亞洲的復甦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戰略環境。

然而,中美關係的緊張,打破了平衡,引發了有關亞洲未來和新興國際秩序形態的深刻問題。東南亞國家也被迫牽連其中,做選擇成了最難的事。

如果任何一方試圖迫使亞洲各國非要做出選擇,就像華盛頓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,亦或是北京尋求在亞洲建立一個專屬勢力範圍,那么中美關係將迎來長達十年的對抗,也就進一步威脅未來的亞洲世紀。

美利堅治世的兩個階段

20世紀,亞洲的“美國治下的和平”大致可以兩個迥然的階段。

第一階段是冷戰的前幾天,也就是從1945年到1970年,美國及其盟友與蘇聯集團爭奪話語權,提陞影響力。

當時的中國雖與蘇聯集團聯手,對抗美國,卻力不從心。處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不說,經濟上也比較保守,內向而封閉,更不要提與亞洲國家之間的對外聯繫。

而反觀亞洲整個局勢,卻是一片大好。亞洲其他地方的自由市場經濟正在抬頭,先是日本異軍突起,再到香港、新加坡、韓國和台灣等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的聚群出現。

那為什麼說美國為亞洲世紀的出現提供了有力的戰略環境呢?

首先,美國提倡建立一個開放、一體化和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,並提供一套評定措施和促進發展的安全保護傘,讓全球各國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高屋建瓴,大家一起參與,一起合作,一起共贏。

其次,美國跨國企業在亞洲大量投資,帶來了原始資本,融合了技術與創新。自由貿易和美國市場的開放,更促進了亞洲與美國貿易的逐漸增長。

第二階段則是在1970年之後。

1971年,當時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,為兩國恢復建交作了鋪墊。

1978年,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,助力中國經濟騰飛。

到1990年代末,經濟壁壘逐漸消除,國際貿易迅速瘋漲。越戰結束後,越南和中南半島的其他國家將精力從戰爭轉移到經濟發展上,也快速迎來發展。

受地緣影響以及中國勢頭的帶動,亞洲國家也從原來依附美國的單一戰略路線,也逐漸向中國靠攏,與中國的貿易、旅遊的供應鏈也聯繫緊密起來。

短短幾十年,中國就實現了“逆襲”,從“掉隊”到成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的經濟夥伴。隨之而來的是,中國擁有了更多的國際影響力。

當然,這也是在“美式和平”下的勵志故事。中國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,也沒有試圖這樣做。事實上,中國受鄧小平思想的影響,選擇韜光養晦,把農業、工業和科技的現代化實現放在軍事力量之前,這一舉動,無疑明智的。

所有亞洲其他國家,尤其東南亞國家可以和中美都建立聯繫,享受魚與熊掌兼得的好處。1989年,亞細安成立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、1994年成立亞細安區域論壇,以及2005年以來每年召開東亞峰會等方面,加深了亞洲區域的聯繫,發揮了核心作用。

在這期間,中國總理每年都會到訪一個亞細安成員國,會見亞細安各國領導人,準備充分地闡述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看法,並提出加強中國與亞細安成員國合作的建議。

隨着利益的增加和聯繫的深化,中國也提出了“一帶一路”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。合作在深化,但這是一個開放的區域架構,中國沒有絕對的影響力,美國仍然是重要的參與者。

改革開放40年來,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經濟、技術和政治影響力翻倍增長。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已不再引用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思想,而是大刀闊斧地建設軍事力量。

它一直致力于陸軍和海軍的現代化,鍛煉一支世界級的戰鬥力量。勵志成

為大陸大國,也成為一個海洋大國。中國越來越希望擁有海洋權益和國際話語權,這本無可厚非。

與此同時,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依然穩固。隨着美國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(GDP)中所佔份額的減少,正在重新評估其宏觀戰略。

雖然目前尚不清楚它是會繼續承擔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任,還是會轉而採取更狹隘的“美國優先”方式來保護自身利益。在華盛頓對其在全球體系中的責任提出根本性反思之際,它與北京的關係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。

美中的重大抉擇

中美兩國的關係,需要進一步的明朗化,它們各自面臨着重大抉擇。

美國面臨的選擇是,避免生存威脅從而遏制中國或者承認中國的崛起。

如果美國選擇前者,美國選擇試圖遏制中國。

那很有可能引發中國的反抗,迫使兩國走上長達十年的對峙之路。

美國並未墮落,依然有很強的韌性和實力,其中優勢之一,就是它強大的人才吸收能力。就比如9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,有8位

是美國公民或後來入籍成為美國公民。

另一方面,中國的實力也不容小覷,它也遠非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,在經濟方面擁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進的技術。

所以這兩個國家的對峙,幾乎不會像冷戰時期,以另一方的和平奔潰為終局。對峙,也就註定了是場持久戰。

如果美國選擇後者,承認中國的崛起,就必須與中國打交道,儘可能促進合作和良性競爭,而不讓競爭傷害整體關係。並採用類似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所遵循的規則和準則。

雖然美國華盛頓有部分人表示這條路是行不通的,與北京的接觸已經失敗,有必要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來維護利益。但從宏觀着手,最大限度地滿足中國的抱負是有意義的。這有利于保障所有國家的責任和限制,加強信任、管控衝突,並為合作和競爭創造更安全、更穩定的環境。

就中國而言,它同樣面臨着選擇。

如果中國決定成為一個不受制約的大國,也注定不會太順暢,同樣要冒着遭到美國和其他國家強烈抵制的風險。而且這種行為從長遠來看,也會加劇緊張和不滿情緒,影響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。

儘管中國在努力打造海外的軟實力影響力,建造孔子學院,投資國際報紙和電視媒體等等,但加拿大、美國,以及其他亞洲和西歐國家的人,對中國的看法卻越來越負面。這樣的形勢,對它是不利的。

如果中國承認自己的進步,並接受世界目前對它抱有的更高期望。

那麼在政治上,中國就不會再享有它在較小和較不發達時所獲得的優惠和特權,比如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慷慨條款。

一個古老文明崛起的、更強大的中國,不僅應該尊重全球規則和規範,也應該承擔起更大的責任,維護和更新中國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國際秩序。如果現有規則和規範已不再適用新形勢,那麼中國就可以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,制定一份大家都可接受的新修訂出來。中國應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,制定出所有國家都能接受的訂正安排。

無論何種選擇,強大的國內壓力推動和約着兩國的外交政策選擇。

因此,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,這兩個國家會根據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來處理雙邊關係,甚至擁有互利共贏的共同願望。衝突、對峙也佔有不小比例。

亞太區域的勢力變化

世界範圍內也出現了多方的勢力變化,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區域,也正是亞太地區,而美國也在這個區域充當重要角色。

亞太區域的勢力變化

世界範圍內也出現了多方的勢力變化,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區域,也正是亞太地區,而美國也在這個區域充當重要角色。



在太平洋戰爭中,美國為了擊敗日本,美國花費了大量資源,也付出了慘淡的代價,甚至差點失去未來的3位國家領導人。在朝鮮和越南的戰爭中,美國同樣付出了高昂的代價。這也為亞洲非共產主義的國家鞏固了社會和經濟,為贏得與共產主義

的一套行為準則,亞洲國家也很務實,如果局勢進一步嚴峻,甚至發生衝突,美國的支持也不會白白授予。所以它們準備自強,去團結合作捍衛自己的國家權益。如果它們選擇與中國合作,希望美國可以理解,這並不是敵對行為。

包容性的區域架構

除了中美關係,其他亞洲國家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
首先是日本,它在首相安倍晉三的領導下,對亞洲區域做出了比以往更積極的貢獻。

2017年,美國退出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》(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,簡稱TPP)後,日本挺身而出,推動其餘11個成員國完成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》(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PP,簡稱CPTPP)。幫助太平洋兩岸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,朝自由貿易再邁一步。

其次是印度,它也具備極大的潛力。總理莫迪作出戰略調整,宣佈“東向行動政策”,贏得了其他國家的支持。同時,東亞峰會也接納了印度成為成員國,激勵其他成員國發憤圖強,實現區域合作的價值。最終,印度缺席RCEP,這也讓這個組織的意義減色不少。

此類協定的價值,已經超過能給亞洲國家帶來的經濟效益。這些平台使亞太國家能夠相互合作,在此成功的過程中發展利害關係,並共同塑造區域架構和管理該架構的規則。

這種區域安排必須是開放和包容的。它們不應有意無意地把任何一方拒之門外,杜絕破壞合作安排,搭建成對集團,或迫使各國被迫的選邊站。對立不能改變什麼。這也解釋了CPTPP成員國為美國再次簽署協定敞開大門,RCEP的國家也仍然希望印度有朝一日會加入。

本着這樣的思维方式,亞太國家也支持日本、美國及其他國家提出的各種“印太”構想和中國的“一帶一路”倡議。大家意識到,支持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是適應中國在本區域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建設性方式。只要方式得當,不破壞國際紀律,這倡議的項目可以很好地促進區域和多邊合作。同時也滿足發展中國家改善基礎設施,實現互通有無的暢想。

當然,這些倡議也存有弊端。缺乏透明度、弱化可行性、造成財政負擔,或阻止主要經濟體的聯繫。這樣也會適得其反,反而給中國造成不好的影響,威脅它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。

發展新的區域安排,並不是說要捨棄現有的多邊機構。它們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,為所有國家,特別是較小的國家提供一個共同努力、促進集體利益的框架。

然而,現有的框架也亟待與時俱進,及時調整,許多現有的多邊機構迫切地需要改革。

世貿組織從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以後,就再難達成統一的協定。因為通過任何一項協定都需要164個成員國的一致認可,如果去平衡大家的利益和經濟政策成為難題,這個難度也可想而知。

而且,從去年開始,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就因爲法定人數不足而一再閑置,空有機構。毫無意味,這是所有國家的損失,我們應該爲這些組織開展建設性工作而改革,而不是削弱它們的效果或完全繞過它們。

非常時期 對抗病毒、促進合作才是正道

毫無疑問,中美關係將重塑全球秩序的格局。

大國競爭無可厚非,而合作能力才是對治國之道的真正考驗。氣候變化、核擴散和傳染病傳播等全球問題愈加棘手,這也需要各國通力合作,一直對抗。

尤其是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席捲全球,更是爲我們敲響警鐘。病毒沒有護照,不受國界影響,對全球範圍都造成傷害。非常時期,我們迫切需要國際合作來控制這場流行病。

然而,不幸的是,病毒的蔓延正在加劇中美之間的對抗。雙方互相指責,信任危機一觸即發。當然,美國總統的選舉也會加劇這種矛盾的激化。我們只能希望,大家可以理智起來,集中心思,冷靜地對待問題。

與此同時,亞洲國家正爲對抗冠病,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,創造一個更安全、更繁榮的區域而努力。亞洲國家的成功和亞洲世紀的實現,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兩國的戰略走向,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。(原標題:新加坡總理李顯龍:中美關係的對抗,這個時代的根本問題!)

